



图杨镇宇 余振盛 梁杰之俊
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李娇娇 实习生 郭一江

“粤派批评”十年路： 从“是否成立”到“正当其时”

今年正值“粤派批评”倡议十周年。7月23日下午,“守正、破局、开新——‘粤派批评’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”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。

蒋述卓、林岗、陈剑晖、韩春燕、申霞艳、刘茉琳、唐诗人、梁宝星等文艺评论界名家及主办单位代表黄翎诗、陈桥生、邓琼齐聚一堂,共同回望“粤派批评”十年路,展望未来发展路径。会议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高级编辑吴小攀主持。



蒋述卓



林岗



陈剑晖



韩春燕



申霞艳



刘茉琳



唐诗人



梁宝星



特色:在边缘画出更大的圆

林岗:“粤派批评”在广东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,我总结为两点:第一点是配合了国家“共建人文湾区”的大战略。“粤派批评”的重要阵地之一是《大湾区文学评论》,随着国家战略逐步落地,“粤派批评”在大湾区的地面上调动起各方文艺力量,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,为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工作作出了贡献。第二点是形成“各自为战”的格局。“粤派批评”的评论力量分散于高校、作协、文联等不同机构,各展所长。有人专攻文学,有人深耕艺术,构成了“粤派批评”丰富的生态。这种分散格局,并不削弱其作为整体力量在行业中的表现。今天的文艺生态如网络文学等蓬勃发展、日新月异,需要我们更多年轻评论力量的加入。

陈剑晖:“粤派批评”的总体特色是注重日常化、本土经验与实践性。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,而非深刻;追求圆通,而非新潮。具体而言,即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相结合,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,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挖掘齐头并进,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,多元开放与独立人格互为表里。这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践行方式,也是他们的共性与个性所在,是广东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。

申霞艳(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:在我看来,“粤派批评”最突出的特点是海陆互动带来的现实关怀与伦理重构。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根基,从近代康有为“托古改制”、梁启超“三界革命”,到刘斯奋、林岗的《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》等

打开岭南与中原、中西文化的对话,再到陈桥生《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》对岭南文化源流及流寓文人作用的梳理,都体现了立足现实、回应中心话语的批评传统。伦理重构是羽翼,海陆互动推动传统伦理与现代商业伦理融合。广东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,既是近代革命策源地,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这种独特经验为批评伦理重构提供了丰厚土壤。

刘茉琳:除媒介性外,“粤派批评”还具有鲜明的地方感。“粤派批评”深深扎根于广东的在地性之中,有传统、有来源。早在1986年,《羊城晚报》原总编辑吴有恒便提出“应有个岭南文派”。互联网初兴时,“地球村”概念盛行,地方性似乎将逐渐湮灭。然而事实证明,地方感曾短暂模糊,却很快重新清晰,甚至主体性更强。粤派批评不仅不过时,反而正当其时。

与地方感相伴的,是粤派批评的“生长性”。广东文艺市场近年空前繁荣,演出、展览人气高涨,人们对文艺批评的需求极高。短视频时代,人们没耐心看完整作品,却热衷看各种讲解评论,折射的正是绩效社会带来的“信息渴求”与“信息焦虑”。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,互联网生态活跃,年轻受众庞大,民间写作活跃,对及时、短小、精准的批评呼唤更为迫切。粤派批评的“生长性”,正体现在它敢于跳出书斋,在新媒介环境中寻找与大众对话的可能——这与它一贯务实、开放、贴近现场的传统一脉相承。文艺评论不同于

文学研究,它必须面对大众。因此,这恰恰是评论的时代,问题只在于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中做好评论。

唐诗人(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: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十年,直接受益于“粤派批评”相关话语的影响。我的很多文章,都是借助“粤派批评”搭建的栏目、研讨会、活动才得以产生;我也通过这个平台组织了少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。十年来,广东文学与文艺评论事业的推进有目共睹,“粤派批评”在其中发挥的聚合与助推作用,是不可替代的。

梁宝星(《花城》杂志编辑、作家):在《花城》编辑部工作的这些年,我阅读、编辑了很多粤派批评家的文章,印象最深的是蒋述卓、贺绍俊、陈培浩及唐诗人等推动“新南方写作”从地域议题走向全国热点的努力。

作为青年作家,我是“粤派批评”的直接受益者。申霞艳、李德南等师友的评价不做空泛的理论说教,而是扎根文本、直面创作现场,精准点出青年写作易陷入的套路化、同质化问题。我在他们的批评中看清时代写作的通病,反思自身的短板。谢有顺教授的批评思想对我的写作影响尤深。他在《通往小说的道路》中写道:“将形式提升到精神的高度,获得一道观察人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。”我始终为了,小说的形式探索不是炫技,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抵达精神内核;所有的写作,最终都是为了获得那道“观察人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”。

未来:从地方经验到全球南方

立自己的评论体系;二是提出独特的理论或批评主张,有引起全国学界注意的声量;三是通过学术谱系的梳理,推动“粤派批评”丛书的出版。我们原计划出到五十本左右,目前仅出版了三十来本。我希望尽快把丛书做到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,乃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出生的批评家,此事宜早不宜迟。

其次,不能只会“生孩子”,还要学会“取名字”。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。“打工文学”最早发端于广东,却因命名不够精准,北方人难以理解,始终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。反观梁启超、黄遵宪提出的“诗界革命”“小说革命”,旗帜鲜明,一击即中。未来,“粤派批评”必须在理论提炼和概念命名上多下功夫。

第三,要紧密结合广东新的文学发展实际,不能悬浮在空中,而应着眼于具体的文学现象。广东网络文学起步早、成果突出,省网络作协已成立十年,但我们缺乏深入的讨论与梳理;海洋文学方面,广东几乎没有系统的关注;科幻文学方面,对其诗学建构和理论探讨尚未有效展开;方言电影与方言文学也值得深挖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影响很大,但我们几乎没有从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。

此外,对“新南方写作”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东、广西,而应放在“全球南方”的视野中去理解,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建构,由此获得世界文学的意义。

陈剑晖:“粤派批评”如何再出发?第一,要完善自身的评论体系。“粤派批评”的建设仍在路上,要真正走出广东、提升全国影响力,不能满足于口号和合法性的探讨,而应上升到理论形态,建

立自己的评论体系;二是提出独特的理论或批评主张,有引起全国学界注意的声量;三是通过学术谱系的梳理,推动“粤派批评”丛书的出版。我们原计划出到五十本左右,目前仅出版了三十来本。我希望尽快把丛书做到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,乃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出生的批评家,此事宜早不宜迟。

其次,不能只会“生孩子”,还要学会“取名字”。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。“打工文学”最早发端于广东,却因命名不够精准,北方人难以理解,始终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。反观梁启超、黄遵宪提出的“诗界革命”“小说革命”,旗帜鲜明,一击即中。未来,“粤派批评”必须在理论提炼和概念命名上多下功夫。

第三,要紧密结合广东新的文学发展实际,不能悬浮在空中,而应着眼于具体的文学现象。广东网络文学起步早、成果突出,省网络作协已成立十年,但我们缺乏深入的讨论与梳理;海洋文学方面,广东几乎没有系统的关注;科幻文学方面,对其诗学建构和理论探讨尚未有效展开;方言电影与方言文学也值得深挖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影响很大,但我们几乎没有从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。

此外,对“新南方写作”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东、广西,而应放在“全球南方”的视野中去理解,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建构,由此获得世界文学的意义。

陈剑晖:“粤派批评”如何再出发?第一,要完善自身的评论体系。“粤派批评”的建设仍在路上,要真正走出广东、提升全国影响力,不能满足于口号和合法性的探讨,而应上升到理论形态,建

十年“粤派批评”的在场姿态

陈桥生(羊城晚报专职编委):“粤派批评”是近年来由媒体副刊发起的现象级文艺事件,集中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文艺评论中的引领作用。从讨论发端,到成立工作室、出版丛书,《羊城晚报》副刊持续用力,在主管部门、学界与出版界多方协作下,梳理、讨论、争鸣,树起了“粤派批评”的旗帜,影响及于海内外,恰如冯友兰先生所言:“五色交辉,相得益彰;八音合奏,终和且平”。

2016年5月,《羊城晚报》联合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,举办“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”学术研讨会,“粤派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广东力量”是其中的议题之一。同年6月5日,《羊城晚报》整版推出《“粤派批评”一说成立吗?》,采访陈平原、洪子诚、黄一平、杨匡汉、古远清等与会学者,特邀陈剑晖撰写长文,综合呈现赞成、反对、中立多方声音,于学理上完成对“粤派批评”的建构,正式亮出旗号。报道甫出,即获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慎海雄同志批示肯定,称其“交通、交流、交融很有意义”,鼓励广东文艺界“敢于在‘批评’上下功夫,用实力打响‘粤派批评’”。这一高规格批示极大推动了讨论的升级,文艺界群策群力,讨论持续深入。

源起: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

陈剑晖(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:在“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”学术研讨会上,我作了《“粤派批评”的可能性》专题发言,古远清教授则以“学术相争”的形式,提出应当有“粤派批评”。

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为广东批评家实力雄厚、个性鲜明,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低估,甚至被遮蔽。有必要让“粤派批评”浮出水面,发出更响亮的声音,成为广东文学批评的一张名片。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。洪子诚教授、杨匡汉教授主要从传统文学流派的角来衡量,认为要有领袖、旗帜、章程和组织,还要有一批作品来体现理论主张。但我的看法是,不必用那种固化的流派观念来框定“粤派批评”。它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。回头看,“粤派批评”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级文化事件,主要有几重原因:有历史纵深,有现实依托,有文化与情感的共情,有可操作的抓手。这与《羊城晚报》及时深入的介入密不可分。

林岗(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):对于“粤派批评”,我们不能拿古代“流派”的概念来框定它,更不能因为古代有“派”就否定今天。如今的文艺形势变了,批评理念可以千差万别,“粤派批评”甚至不必是实体组织,也可以成为一个平台、一种新的文化现象。“粤派批评”这个口号对广东文艺批评工作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。

蒋述卓(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:十年来,“粤派批评”取得了不少成果。其一,获得理论界积极回应。很多教授纷纷撰文,从学理上予以完善和建构,使之从媒体报道的话题上升为学术讨论的命题;其

二,在全国文艺评论界产生广泛影响。我与陈剑晖教授策划的“粤派评论”丛书,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,得到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多家媒体刊发报道,反响热烈;其三,学术体系得到系统梳理。我曾撰文《建构“粤派批评”的学术谱系》,专门论述过这一学术谱系的建构问题;其四,人才成果丰硕。

韩春燕(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,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):广东作者这些年一直是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的重要作者群,数量可观,质量也相当出色。今年鲁奖得主谢有顺、贺仲明,都曾获得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的“当代中国优秀批评家奖”。广东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,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汇聚于此。众多评论家以方阵之势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舞台,他们才华与成绩有目共睹。

刘茉琳(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副院长、教授):《羊城晚报》倡导的“粤派批评”具有很强的“媒介性”,有别于一般书斋式评论,这也是“粤派批评”最主要的特色之一。形式上,调动专业资源,做迅速、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;内容上,覆盖文学、艺术、演出、展览等领域。“粤派批评”关注大湾区的全文艺生态,以全媒体形式介入,既能调度专业性,又兼具融合性。

这十年,媒体迅猛发展,文艺现象多元交融,《羊城晚报》赋予“粤派批评”以媒体敏感度,反应及时,对热点追踪乃至预判颇为有效。二十世纪以来,“媒介化”成为新世纪文化生活的核心影响力。“粤派批评”是羊城晚报十年推动的清晰印记,也期待在未来继续深化践行。